



让事物说话
哲学与技术科学
John Dewey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
定价50.00元

阴采访者隋连庆 王立刚 吴敏

问隋连庆 曾经先后三次访问中国，您能谈一下访问中国的经历和感受？特别是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印象。

答隋连庆 2004年以来，我曾三次访问中国。我的第一次访问是与安德鲁·芬伯格、兰登·温纳等美国哲学家一道，访问了沈阳的东北大学，并随后访问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6年我又访问了北京大学。2007年我第三次来到中国，访问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南理工大学。这些学术活动让我对中国高等学府有了一些初步的印象。当代中国文化显示出来的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名胜古迹和各种艺术。

对于中国科技哲学界，我的第一个

唐·伊德 技术哲学的新浪潮

美国哲学家唐·伊德(1934-)现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目前是该校哲学系的杰出教授。伊德的研究领域涉及现象学和技术哲学。先后在这些领域中出版了学术专著13部。2006年4月，应北京大学哲学系靳希平教授和吴国盛教授的邀请，伊德访问了北京大学，并就现象学和技术哲学的问题作了5场讲演。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列入“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技哲学丛书”)一书，收入了伊德在北京大学演讲的4篇讲稿。伊德的代表作《技术与生活世界》也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译者韩连庆和该书编辑王立刚、吴敏对伊德教授进行了采访。

惊奇发现是，人们说话的语气和研究的兴趣都很贴切时代。在这之前我曾设想，自己可能会被问到一些跟科学技术学(scienceand technologystudies)的历史有关的问题。但是所到之处却发现，人们的主要兴趣是“有什么新动态”，这表明中国的研究者非常好学，我很乐意满足这样的需求。作为我访问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成果，我的讲稿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对我来说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耀。

问隋连庆 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学术经历和美国技术哲学的发展现状。

答隋连庆 我今天所说的“科学学”(science studies)，“技术哲学”和“科学”(或技术科学)的文化研究是近几十年才兴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数十年之后首先在欧洲产生了技术哲学。这时候我们会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和德国工程师和哲学家德索尔出版的《技术哲学》。不过在美国，我自己在1979年出版的《技术与实践：一种技术哲学》经常被认为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技术哲学著作。此后我又出版了一系列其他著作，其中包括《生存的技术》、《技术与生活世界》、《工具实在论》、《扩展的解释学：科学中的视觉主义》和《技术中的身体》。在这些著作中，《技术与生活世界》和《工具实在论》最近都将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要课题，因此，本书第五、第六、第七章集中探讨了与科学辩护密切相关的证据问题。其中，第五章从证据的相关性与效用度评价入手，探讨了证据选择与效用评价的规则和程序。第六章讨论了反常证据与科学检验及理论进步的关系。第七章就思维实验及其检验的合理性问题展开了讨论，以进一步为科学辩护作出有力辩护。

当科学理论获得证据所给予的一定程度的支持或确证后，科学主体就会给出某种态度的选择，即是否予以采纳或接受，而这种态度选择又是科学辩护的重要阶段与科学辩护的沉思

科学辩护与科学接受的方法论解读

1997年，一些荷兰的技术哲学家出版了一部关于美国技术哲学发展现状的著作，这部著作在2001年被翻译成了英文，书名叫《美国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这些荷兰哲学家认为，阿尔伯特·伯格曼、赫伯特·德雷福斯、唐娜·哈拉维、安德鲁·芬伯格、兰登·温纳和我这六位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研究方向已经不同于20世纪早期欧洲哲学家(海德格尔、奥特尔·加塞特和雅斯贝尔斯等人)，这些新一代的研究者更少信奉托邦(即反面乌托邦)，更加实用主义化，采取了研究具体技术而不是一般的“技术”的经验转向。

问隋连庆 您如何看待现象学和技术哲学之间的关系？您自己目前有什么新的著作或研究计划吗？

答隋连庆 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历时多年。20世纪70年代，我对知觉现象学很感兴趣，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有关听觉经验的《倾听与声音：声音的现象学》，另一部是研究视觉现象的《实验现象学》。当我转向技术哲学的研究后，这种兴趣就转化为对工具的关注，特别是对科学中的工具。同时我也对乐器很感兴趣。我一直保持着这种兴趣。我已经基本完成了一部关于成像技术的著作，此前也在一些出版物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当代成像过程的文章。同时，我也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现象学研究的风格，我将这种新的风格称为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后现象学结合

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和传统现象学的一些因素，主要关注“经验转向的案例研究”。中文版《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是我这些兴趣和研究的一个大体规划。该书的英文版也将在今年出版。

问隋连庆 世纪后半叶以来，袁科学技术造成的一些问题频频引发了人们对科技的疑虑，气候变暖、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问题的出现，席卷了全球范围内对科技争论浪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隋连庆 环境问题、转基因技术等问题来指科学本身，这实际上是把科学划归到不属于它的领域中。只要是人来发展科学实践的，那么所有的科学都是人类的。我认为是“科学和人”，或者更好地说是“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和人“造就了我们目前的问题和两难困境。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一些环境问题，比如动物灭绝的问题。地球上曾经有过多次的动物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前科学时期，甚至发生在人类起源之前，比如恐龙的灭绝很可能是太阳系之外的巨大陨石撞击地球后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已经证实，在冰河世纪，人类在完全没有现代科学或者技术的情况下对猛犸、巨鹿等大型哺乳动物的捕猎，加速了这些物种的灭绝。现代科学和技术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影响的范围更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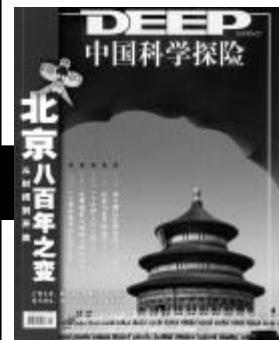
量更大。使用大型拖网的捕鱼船队可以捕尽整片海域；生锈带^④指美国中西部诸州，这些地区曾经是美国传统制造业的中心，现在这些企业均已衰落——译者注)地区为钢铁厂提供煤炭，这些钢铁厂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一个使用大型电锯的现代工人砍伐的树木，要比一个世纪前一大群伐木工人砍伐的树木还要多。

我们理所当然为人类的未来担忧。

在今天的科学技术世界中，我们的未来注定与科学息息相关。但是科学是与人类有关的科学，人类也是这一图景中的一部分。如果要扭转由人类所导致的全球变暖现象，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技术风格和类型的变化也是这种扭转的一部分。工厂排放洁净的废弃物、受到控制的海洋捕捞或水产养殖、对人类更加有益的遗传操作，所有这些还是属于技术科学的范畴。坦率地说，我们既不可能放弃科学，也无法回到臆想中的前现代阶段，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是我们的人口太多，不可能这么做。

我曾经在一种更切合的意义上指出，从伦理的和社会的角度来对技术进行思考，重要的是不要在新技术已经准备建立起来之后再来思考技术，而是要在新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阶段，在我们首先关注这些新的发明是什么和如何发展起来的地方来进行我们的哲学思考，这才是真正的起点。

封面故事



北京 5个特殊的年份

2008年8月8日，随着奥运会的开幕，袁北京必将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这座曾经的帝王之都，今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迎来她历史上最为辉煌开放的时刻。遥望千年兴亡事，袁笑一笑，瞬间，我们有意截取北京5个特殊的年份：1901年袁世凯从波罗到元大都的1275年；袁世凯从北京的190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和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袁以外，来者的视角对这5个年份的北京城与北京人的生活进行复原，袁诠释一个屈辱和辉煌交织的封闭与开放转换的北京。

■ 中国科学探险杂志



黑洞主宰宇宙

最近的宇宙观测揭示，黑洞可不只是端坐在星系中央的摆设，袁它们在塑造着星系至规范着星系的发展。浴可以说，它们是宇宙中当仁不让的主宰。

星系的源头是什么？它们在宇宙的历史中是如何演变的？9年来，袁人们每当面对这些问题时，袁都会考虑到在它们内部存在着超大质量的黑洞。最新的X射线探测卫星如CHANDRA和XMM-Newton所进行的观测，袁加上其他对低能量辐射的观测，共同揭示了黑洞及其宿主星系之间的频繁互动。袁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袁这些黑洞是如何诞生的。

——《新发现》杂志



寻找赤壁

古人记史贵在简要，而对后人来说，袁古人叙事病亦在简要。果真，当年稍微多写几句赤壁的具体方位，袁还会后人的争论吗？在古代的历史写作中，袁不断叠加的材料不断地重构着历史。袁相却渐远去，袁

1998年袁，蒲圻市正式更名为赤壁市，袁持黄州赤壁的学者持反对意见。袁一方面认为，蒲圻独霸了历史资源，袁另一方面认为，张冠李戴，势必贻害后人。袁王琳祥给记者看了一份当时他代黄冈市政府写的反对意见书，袁认为蒲圻改名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的确，袁历史经常这样有意无意地被改变。袁而近年来各地兴起的改名风，袁更是不知会给后人造成多大的麻烦。袁们不知道，到底谁该对历史负起责任呢。

——《华夏地理》杂志

·百年科技期刊巡礼·

《清华学报》的创造

阴 姚远 杜文涛

1915年，清华建校的第四个年头，袁辛亥革命风暴后的中华民国，仍喘息未定，袁南北震荡依然，袁清华学子们自清末以来肇始并保留的西去留美、科考救国的热情却有增无减。

时任校长周诒春于1915年5月以清华学会的名义创办《清华月刊》，袁中文各半，袁1915年12月又改由清华学校名义主办，袁含中英文两种版本。袁隔期出版的《清华学报》(Sing Tzu Journal)。袁，清华学子们自清末以来肇始并保留的西去留美、科考救国的热情却有增无减。

其时，校长周诒春于1915年5月以清华学会的名义创办《清华月刊》，袁中文各半，袁1915年12月又改由清华学校名义主办，袁含中英文两种版本。袁隔期出版的《清华学报》(Sing Tzu Journal)。袁，清华学子们自清末以来肇始并保留的西去留美、科考救国的热情却有增无减。

为了解读此次G8峰会上各国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新政策，分析世界低碳发展的迷局，7月11日下午，气候变化报道俱乐部在中国人民大学理工楼举办了解读G8峰会座谈会，本次座谈会特地邀请了参与制订中国低碳发展的能源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策略的相关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邹骥教授和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院刘滨副教授与关注气候变化报道的同仁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应对气候变化成热点

今年G8峰会的主办国日本将环境和气候变化定为本次峰会的主要话题。日本提出了“地球降温50建议”。它要求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到2050年比1990年减少50%，全球能源使用效率到2020年比现在提高30%。日本同时倡议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碳排放框架协议，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延续。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斯特恩报告、布莱尔的报告、欧盟和美国的报告，以及各种专家、媒体的报道，包括在《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都在讨

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温升的临界值到底是多少？2℃、3℃、4℃还是5℃？IPCC第二工作组第四次工作评估报告出台以后，一直把全球气候危险的升温定在2℃。温升是直接和未来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浓度挂钩的，2℃也就相当于未来全球的温升不能超过450ppmCO₂，然而目前已经达到430ppmCO₂。

科学家根据IPCC第二工作组第四次工作评估报告给出的数据推算，如果未来全球温升保持到450ppmCO₂，就要求2010年左右全球CO₂排放量达到峰值，之后排放量就要下降，到2050年比1990年至少减少50%。有了这个目标之后，就有个全球减排义务分担的问题。《公约》里虽然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但是，如果这个目标真的定到了450ppmCO₂，e2050年比1990年至少减少50%，也就是意味着到2050年每个人每年排放2吨二氧化碳，这样的数据是相当惊人的。正如刘滨教授所说：“一个目标提出来很容易，但是它背后隐藏着这些问题要通过计算，进一步来看它的实质。”

针对这个目标，我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个目标合适不合适？这个目标是科学的吗？实际上现在科学上并没有定论。所以全球在谈判这个气候变化的目标和机制，谈判的过程之中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减排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协调和权衡好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减缓以及经济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把这个目标定得过紧会限制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最为不利。如果定得过于宽泛，又会对全球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实际上对于这个目标如何选择，

定于20世纪初期中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这一期刊类型的基本模式，最早在刊名上缀以野草报治二字并以学校名义出版的学术期刊，袁它也说明中国高校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报或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模式和野草报治的模式并非外来袁而是自有其本土源流。袁清华学报袁1920年至1923年停刊袁924年6月6月复刊，袁抗日战争期间，袁校迁昆明出版，抗战胜利后回北平出版，袁从1915年至1948年袁共出版90余期。袁清华学报袁1948年1月复刊，袁一脉相承。

其时，1915年至1919年的中英文版学报发表了百余篇介绍欧美最新科学与技术教育理论的文章，袁到了到访清华的美国政治学家克罗博士等人宣扬西方民主制度的演讲或专文，袁还发表了清华科学社有关中国农业、工业技术与教育发展现状的数种社会调查报告，袁所发表的叶企孙等人的数学史论文，袁标志着我国数学史学科的奠基，袁营造了五四运动前夕浓郁的科学民主气氛，袁不像清末民初其他期刊那样袁借助留日师资，袁由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传播西学，袁而是借助留美师资，袁用中英文两种语言直接从欧美传入最新西学，袁从而开创了高校学报传播西学的新途径。

其另一重要创造是与其后1919年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和创刊号为英文，袁双号为中文。

清华学报的前身《清华月刊》和创刊号为英文，袁双号为中文。

解读G8峰会 关注气候变化

阴 本报实习记者 范明荣

今年的G8峰会于7月7日~9日在日本北海道召开。高油价下的世界经济走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后京都协议……这些都是该会议的主要议题。中国能否实现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政策将如何得到落实？

为了解读此次G8峰会上各国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新政策，分析世界低碳发展的迷局，7月11日下午，气候变化报道俱乐部在中国人民大学理工楼举办了解读G8峰会座谈会，本次座谈会特地邀请了参与制订中国低碳发展的能源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策略的相关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邹骥教授和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院刘滨副教授与关注气候变化报道的同仁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应对气候变化成热点

今年G8峰会的主办国日本将环境和气候变化定为本次峰会的主要话题。日本提出了“地球降温50建议”。它要求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到2050年比1990年减少50%，全球能源使用效率到2020年比现在提高30%。日本同时倡议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碳排放框架协议，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延续。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斯特恩报告、布莱尔的报告、欧盟和美国的报告，以及各种专家、媒体的报道，包括在《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都在讨

还是需要科学家进一步研究的。”刘滨向大家解释道。

中国的压力

我国基本情况和发展阶段特征，使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严峻的挑战。

首先，由于我们国家国土面积大、贫富差距大、海岸线长，造成了我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任务很艰巨。尤其像今年遭遇的一系列灾害，虽然我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但是在应对一些问题时，还是相当困难的。其次，要减排一定会限制我们的发展空间。因为我国还处在发展起步阶段，高能耗的行业占我国经济的比重很大。另外，发达国家还力图模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界限，为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义务。

一旦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50%这样的目标达成，一切的矛头都会指向中国。一方面会引发新的国际竞争和贸易争端，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会设置绿色贸易壁垒，限制高碳产品、设置国际碳税，在国际双边贸易谈判中附加能效和贸易条款等，通过这些措施限制中国。

邹骥也表示：“如果八国这次就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50%达成一致的话，意味着八国集团在这一问题上立场更加统一，这将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中给我们压力。”

这一切都迫使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去探索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督促我们去进行技术创新，寻找新的技术。而低碳经济是我们国家的必由之路，邹骥如是说。

——《华夏地理》杂志